

官员更替、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李后建

(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 推动企业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从官员治理角度出发,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视角分析和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活动,而寻租行为则激发了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动机。并且,随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弱化,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处于制度质量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弱化,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积极影响则逐渐强化。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联盟研发行为的影响因素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理解地方官员治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关键词: 官员更替; 寻租行为; 联盟研发投入; 制度质量; 边际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16)03-0061-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释放体制转轨红利的结果,它通常依靠的是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大批资金的投入。这种粗放型的高速增长保持了三十多年,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它不仅加速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1],而且还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政府各部门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唯有创新才能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第一动力。因此,大力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有效激励企业实施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企业创新活动中,联盟研发有助于企业获得互补性资源、市场信息和投资机会^[2],同时它还能缩短研发周期,拓展产品线的宽度和深度,分摊研发成本和风险^[3]。因此,它不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转型期的战略选择与实现途径。尽管企业联盟研发的收益如此丰厚,但并非所有企业都结成联盟^[4],特别是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经济转型仍面临着不少风险与挑战,市场环境不稳定、正式制度不完善和政府管制过严等问题并存,严重制约了企业致力于创新活动的动机^[5-6],同时也妨碍了企业研发联盟的形成^[7]。因此,在正式制度缺失的经济体中,寻求有效途径促进企业联盟研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而且对于实现中国经济走出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走向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

收稿日期: 2015-10-19; 修回日期: 2016-01-06

作者简介: 李后建(1983—),男,湖南常德人,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62004); 四川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6SB0031); 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农村资源市场化研究团队的资助,同时也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意义。

现有研究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解释主要以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8],其中关于企业联盟研发活动收益的解释建立在资源基础理论上^[9],而有关企业联盟研发活动成本的解释则源于交易成本理论^[10]。然而,在中国政治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政府对企业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干预偏好。特别是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境下,地方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辖区内企业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1]。遗憾的是,鲜有研究提供关于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影响的经验证据。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运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与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影响效应。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首先,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缺乏有关经济转轨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治理对本地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12],本文为丰富这一主题的研究做出了探索性的尝试;其次,现有关于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研究,无论是从融资还是从政治关联的视角,主要着眼于企业研发激励的问题,本文以地方政府官员治理问题为切入点,丰富了人们对中国政治治理模式如何影响经济转型的理解;最后,本文探讨了不同制度质量条件下,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影响,为深层次理解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员治理如何通过寻租行为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 官员更替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官员更替是普适化和制度化的官员治理策略之一,也为理解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官员行为逻辑提供了有益视角。由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程度和执行行为会随着更替时间的长短发生变化,因此地方官员的决策眼界(decision horizon)也会随着更替时间的长短而发生变化。为了让领导有效识别自己任期内的业绩,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通常会优先执行有别于前任的政策体系。由官员更替引致的政策执行波动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政策风险。Lawrence and Lorsch^[13]指出在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松散型组织结构相比集成型组织结构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战略管理的相关文献亦指出,当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时,企业可能偏好灵活的组织形式,例如联盟^[14]。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研发投入收益的前景不明朗,此时,企业迫切需要合作伙伴提供额外的资源并分担相关风险^[15]。研发联盟便为企业提供了应对环境波动和经济衰退的缓冲器,为企业带来了更多可预见的资源流和可承受的风险计划^[16]。由此推之,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激励企业结成研发联盟。

然而,对于处在转型阵痛期的中国而言,地方官员的更替亦会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造成负面影响。首先,在相对绩效考核和有限任期的机制下,地方官员行为的价值取向取决于政治晋升激励制度的设计。特别是在有限任期内,以GDP增长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通常会搞短期化行为。为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胜出,地方官员会引导辖区内企业将投资方向集中于即期回报率较高的短期项目而非R&D这种高风险的长期项目,来迎合自己的政治偏好。其次,当地方官员预计到自己即将离任时,他们会对短期项目显示出更加强烈的投资偏好,而对R&D高风险长期项目则表现得异常厌恶。因为短期投资项目可以满足地方官员有限任期内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目标,增加政治擢升的筹码,而长期投资项目可能使得他们无法在有限任期内享受到长期投资带来的经济成果,甚至可能会让后任官员坐享其成。这也使得地方官员针对企业项目的性质表现出不同的行政效率,当企业的投资项目能为地方官员晋升增加筹码时,企业的投资项目能够较快地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批,甚至可能获得政策性支持。而企业联盟研发项目的前期投资大、风险高、孕育周期长,很难迎合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偏好,因此,政府部门对它的立项审批表现出消极怠慢的状态,这显然会妨碍企业的联盟研发进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研究假设H1:

H1: 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具有消极影响。

(二) 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在动态竞争、知识密集型行业中,大量企业会通过联盟研发的方式来构建和利用技术创新能力^[17],但同时,企业也面临着技术资产的挪用等风险。特别是在正式制度缺失的经济体中,企业联盟研发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为了应对正式制度缺失给企业联盟研发带来的负面冲击,企业通常会选择寻租这种方式为联盟研发提供庇护。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授予投资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享有研发成果所有权的垄断特权,从而确保联盟研发成果的排他性占有,享受研发成果转化带来的经济效益^[18]。然而,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正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不力,企业在联盟研发的过程中时刻面临着由于知识产权纠纷而引发的各类风险。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寻租的方式与政府部门建立政治联系,借助政府部门的强制力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降低联盟研发活动的风险水平。其次,企业通过寻租的方式还能优先享受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种政策性优惠,包括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便利等,因此寻租行为可以为企业的联盟研发投入带来“资源效应”。此外,中国经济的转型给经济环境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面临着联盟研发的战略困境。对于在位企业而言,它们为了避免专有知识泄露、失去主控权、收益分配纠纷或管理分歧而更倾向于单打独斗^[19]。同时,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知的市场需求、竞争和技术的变化。因此,动荡的环境通常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的动机^[20]。尽管如此,企业可能会在战略上通过寻租来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

当然,企业的寻租行为也可能会弱化联盟研发行为。首先,寻租除了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信息和资源之外,还能够让企业享受由政府授予的市场特权所带来的垄断收益,从而有可能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最终弱化了企业通过联盟研发活动来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机^[21],理性的潜在竞争者预料到在位者享受市场特权时,也可能会打消通过研发来进入市场并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念头;其次,企业的寻租行为是一种追求非生产性的既得经济利益的活动,它会降低企业对联盟研发这种生产性活动的努力,而将过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知识的投入与积累。由此可见,企业的寻租行为又将妨碍联盟研发活动。不过,当前中国的经济正逐步转入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鼓励企业创新将成为政府各部门的首要任务,作为理性的企业,应该意识到创新才是企业获得永续竞争优势的内生性动力,因此企业寻租的最终目的仍可能是为联盟研发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从而促进联盟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H2: 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具有积极影响。

(三) 官员更替的调节效应

通常地,企业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与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并通过政企关系的桥梁来获取企业联盟研发活动所需的各种政策性资源。然而,官员更替也将可能导致企业花费巨大精力建立起的政企关系面临着终结的厄运。当然,理性的企业通常会根据官员事先确定的更替周期来决定是否进行寻租活动,从而避免由于官员更替而导致寻租活动失败。因此,理性的企业可能并不愿意在官员更替时进行寻租,更不愿意在失去地方官员庇护的情况下开展联盟研发活动,此时,联盟研发的等待期权价值将增加,联盟研发投入将大量缩减。此外,当官员发生更替时,原有的政企关系所带来的收益会在官员更替的过程中降低。企业又被迫重新寻租,与新的地方官员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22]。然而,企业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即企业短期内难以收集到有关新上任地方官员的全面信息,这也使得企业无法预料寻租的经济结果,更重要的是新的寻租行为又要大量挤出企业致力于联盟研发活动的精力和时间。因此,在地方官员更替之时,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通常会被弱化。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H3: 官员更替会弱化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数据源自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提供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这次调查的执行时间是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被调查的企业是通过对企业注册域名的分层随机抽样来确定的,受试对象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包括总经理、会计师及其他高层管理者。这次调查主要通过邮件和电话回访的方式回收样本,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2848个,其中中国有独资企业的占比为5.2%,其余为非国有独资企业。这些企业均匀分布在参与调查的25个城市、26个行业领域。整体而言,这次调查所确定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在“缺失值”处理过程中,本文遵循以下原则:对过去三年内企业是否与其他企业进行联盟研发做出响应的样本有1728个,其中15个样本给出的信息为“不知道”,为此,我们删除了未响应的样本1120个,同时将回答为“不知道”的样本也进行了删除。同样地,关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缺失值”也做了类似的处理。最终,我们得到的有效样本为1147个。由于“缺失值”的存在使得大量样本丢失,这有可能会破坏原始调查过程中抽样的科学性,从而影响到有效样本的代表性。为此,我们将总体样本和有效样本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其他主要信息在这两组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样本的丢失并不会对抽样的科学性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此外,为了纠正异常值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我们对研究中涉及到的所有连续变量实施了1%的缩尾处理。

(二) 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有效地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影响,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的经验做法^[22]将计量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ALLY_i \text{ or } ALLYINT_i) = \alpha_0 + \alpha_1 TUR_c + \alpha_2 REN_c + \alpha_3 TUR \times REN_c + \gamma X_{i/c}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ALLY_i$ 表示的是第 i 个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倾向,这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若企业在近三年来参与了联盟研发,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同样地, $ALLYINT_c$ 表示第 i 个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强度,这是一个受限因变量,反映的是近三年来,企业平均每年用于联盟研发的投入占年度销售额的比值。 TUR_c 表示官员更替,具体参照罗党论和余满国^[23]的定义,若2010年市委书记和市长未发生更替,则赋值为0;若2010年市委书记或市长发生更替,则赋值为1;若2010年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发生更替则赋值为2,官员更替的数据来源于我们手工收集的数据库。 REN_c 表示寻租行为,这一变量的构建是基于问卷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即“公司有时需要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来‘把事情办好’。这些事情涉及到海关、税收、许可证、规章条例及相关服务等。平均而言,向你们这样的公司向公务员赠送的礼品或非正式支付占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事实上, Berg *et al.*^[24] 和 Diaby and Sylwester^[25] 也用类似的问题来界定寻租行为。由于寻租问题的敏感性(少量受访者可能会承认个人参与了寻租行为),因此问卷中要求受访者评价“像你们这样的公司”的经验,而不是报告他们事实上遇到的腐败官员。进一步地,我们通过计算聚合在城市层面的非正式支付均值作为寻租行为的度量。这种做法的可取之处在于:首先,它有助于减少测量误差。这是因为公司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占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是被试者的估算,这种估算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存在高估或者低估的偏差。为此,我们可以将这一主观估算的偏差视为白噪音。与从企业层面测量寻租行为相比,通过计算聚合在城市层面的寻租行为平均值有助于消除白噪音,减少测量误差;其次,它有助于缓解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而言,它的联盟研发行为通常很难影响到城市层面的寻租风气。 $TUR \times REN_c$ 表示企业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的交叉项,用于评估官员更替对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①。 ε_i 表示的是误差项。

$X_{i/c}$ 表示基于企业和城市层面的两类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包括:(1)企业规模(SIZE),在本研究中,企业规模界定为企业职工总数的自然对数。通常地,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较多

的资源 and 更大的能力去改变网络结构,并快速寻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结成研发联盟;(2) 企业年龄(AGE),我们用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然后取其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年龄的操作性定义;(3) 国有控股比例(SOE),具体定义为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股份所占的比例;(4) 总经理的工作经验(EXPER),本研究将总经理在特定行业领域里的工作年资界定为总经理的工作经验。工作经验丰富的总经理能够有效地辨识、评估和控制联盟研发活动的风险,在联盟研发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显然,工作经验越丰富的总经理越有助于促成联盟研发的形成;(5) 人力资本投资(CAPITAL),正式的培训计划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表现,若企业实施了正式的员工培训计划,则企业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且赋值为1,否则为0。通过正式培训计划,我们可以捕捉到人力资本投资对联盟研发的影响;(6) 银行授信(CREDIT),具体定义为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的授信额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银行授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信贷契约的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企业在联盟研发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因此,利用银行授信可以捕捉到融资约束对联盟研发的影响;(7) 微机化程度(COMPUTER),它定义为使用电脑的员工比例。企业的微机化程度与企业的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从而促进企业联盟研发的顺利开展;(8) 多元化程度(DIVER),具体定义为企业主要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的倒数,多元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越具有开辟新市场的强烈动机,为了开辟新市场、分散风险,企业可能有强烈的动机以联盟研发的方式投资于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等;(9) 企业出口(EXPORT),若企业所有的产品仅面向国内市场,则赋值为0,否则为1。企业出口之所以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出口可以使得企业扩大合作伙伴的搜索范围,有助于企业寻找更加合适的联盟研发合作伙伴,从而促进企业联盟研发;(10) 女性总经理(FEMALE),若企业的总经理为女性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之所以将女性总经理纳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女性管理层的行为更加谨慎,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性。而联盟研发通常是一项复杂和高风险的项目,因此女性总经理通常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的动机。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 城市规模(CSIZE),具体定义为该城市年末总人口数并取自然对数;(2) 商业城市(BUSY),若该城市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则赋值为1,否则为0;(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该指标主要用于捕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联盟研发的影响;(4) 高等教育机构数(EDU),该指标主要用于捕捉城市教育发展对企业联盟研发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高等教育机构数这两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此外,为了控制企业联盟研发行为的地区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我们控制了城市和行业的固定效应^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官员更替、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

在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投资决策影响的过程中,本文充分考虑了内生性和异方差问题,同时纳入了城市和行业层面的满秩固定效应,并估计了聚合在行业性质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考虑到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故本研究在对回归方程(1)进行参数估计的过程中采用Probit模型。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汇报在表1中,在表1的列(1)中,我们仅考虑了官员更替(TUR)和寻租行为(REN)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的影响,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和正。在表1的列(2)中我们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了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表明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beta = -0.1680, p < 0.01$)。这一结果意味着官员更替会显著弱化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的积极影响。为了控制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表1的列(3)和列(4)中逐步纳入了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其结果显示官员更替(TUR)、寻租行为(REN)及其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并无明显变化,且符号仍分别显著为负、正和负。为了进一步明确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入倾向的影响,我们在表1的列(4)中汇报了官员更替、寻租行为及其交互项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影响的边际效应。其中,官员更替的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企业致力于联盟研发投入的概率会降低5.07%,由此佐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1。现有研究提供了解释官员更替抑制企业联盟研发动机的线索。由于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执行波动会使得企业投资前景难以预料,弱化了企业对投资项目价值评估的能力。此时,投资决策中等待期权的价值就会增加,理性的企业通常会暂时搁置高风险项目的投资^[26]。Chen and Funke^[27]指出当投资风险增加时,企业投资的态度将变得异常敏感并会对高风险项目投资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厌恶。因此,地方官员的轮替和交接对企业而言就如同Bernanke^[28]所强调的“坏消息”。具体而言,当坏消息来临时,企业会率先避开或减少高风险、长周期和高投入的项目。毋庸讳言,联盟研发项目是典型的高风险项目,它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和风险高的特点,官员更替会导致辖区内企业优先规避或减少联盟研发项目的投入^[29]。

表1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1)		(2)		(3)		(4)		边际效应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TUR	-0.7676***	[0.1423]	-0.8452***	[0.1986]	-0.7335**	[0.2161]	-0.7190**	[0.2050]	-0.0507**	[0.0129]
REN	0.9704***	[0.1111]	0.8876***	[0.1388]	0.8902**	[0.1412]	0.8161***	[0.1724]	0.0576***	[0.0133]
TUR × REN			-0.1680***	[0.0474]	-0.2091**	[0.0917]	-0.2405**	[0.0921]	-0.0170**	[0.0082]
SIZE					0.2619***	[0.0888]	0.2731***	[0.0819]	0.0193***	[0.0052]
AGE					-0.1036	[0.1742]	-0.1260	[0.1754]	-0.0089	[0.0127]
SOE					-0.6260	[0.6659]	-0.5535	[0.6035]	-0.0390	[0.0425]
EXPER					0.0056	[0.0174]	0.0103	[0.0175]	0.0007	[0.0012]
CAPITAL					0.7467**	[0.3379]	0.7597**	[0.3401]	0.0430**	[0.0170]
CREDIT					0.2983***	[0.0858]	0.3254**	[0.1153]	0.0241**	[0.0110]
COMPUTER					0.8421**	[0.3916]	0.8858*	[0.4884]	0.0625*	[0.0338]
DIVER					0.3203*	[0.1749]	0.0612	[0.5023]	0.0043	[0.0355]
EXPORT					0.5629**	[0.2221]	0.5001**	[0.1962]	0.0381**	[0.0189]
FEMALE					-0.6826**	[0.3477]	-0.6521*	[0.3954]	-0.0368*	[0.0198]
POPULATION							0.9820*	[0.5667]	0.0693*	[0.0417]
BUSY							0.8910**	[0.4192]	0.0486***	[0.0146]
GDP							0.0374**	[0.0155]	0.0027**	[0.0010]
EDU							-0.3069**	[0.1315]	-0.0217**	[0.0102]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产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1.8037***	[0.1445]	-1.7725***	[0.1514]	-4.3910***	[0.8473]	-10.9431***	[3.2896]		
Wald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Log likelihood	-535.1456		-534.4110		-472.9336		-465.9158			
伪R ²	0.1196		0.1208		0.1756		0.1857			
N	1669		1669		1542		1542			

注: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方括号内表示聚合在行业层面的稳健性标准差。

其次,城市层面的寻租水平越高,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概率就越大,即城市的寻租水平从平均值开始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会使得企业致力于联盟研发投入的概率增加5.76%,由此佐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事实上,在转型经济体中,寻租行为可能是市场和法律制度缺失的一种有效替代,通过寻租行为,企业可以优先获得各种资源^[30],而足够的资源是企业联盟研发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特别是在转型的经济体中,政府部门通常不能为知识产权提供足够的正式保护,这迫使某些企业试图通过寻租获取产权保护的替代性机制,从而为企业联盟研发投入提供足够的动力。

最后,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的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官员更替会弱化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的正向影响。交互项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并没有全面反映出交互效应检验的全过程,而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是交互效应检验的一个重要补充,它有助于我们识别出调节效应的真实效力。为此,我们绘制了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如图1所示)。在图1中,横坐标表示的是官员更替,纵坐标表示的是寻租行

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其结果显示,随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在逐渐弱化,由此佐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3。这意味着,官员更替割断了企业通过寻租所建立起的政企关系,使得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失去了有效的保护机制。此时,企业可能需要通过寻租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重新建立起政企关系,而这一过程显然耗费了企业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挤出了企业联盟研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企业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无法确定寻租的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降低风险大的项目投入来规避风险。限于篇幅,不对控制变量做出相关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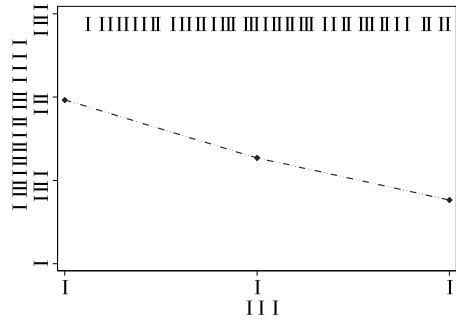


图1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二) 官员更替、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

接下来,我们探究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考虑到联盟研发投入强度为左截尾的连续变量,因此,适合使用T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1)的参数进行估计。具体结果汇报在表2中,表2的列(1)只考虑了官员更替(TUR)和寻租行为(REN)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和正,这意味着官员更替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而寻租行为则会强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表2中列(3)和列(4)在分别纳入了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系数值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其交叉项系数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官员更替会显著弱化寻租行为对

表2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1)	(2)	(3)	(4)	边际效应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TUR	-0.013 6*** [0.002 8]	-0.014 6*** [0.003 7]	-0.011 9*** [0.004 2]	-0.011 5*** [0.004 0]	-0.000 6** [0.000 2]
REN	0.026 5*** [0.003 4]	0.025 1*** [0.003 7]	0.019 3*** [0.002 9]	0.017 8*** [0.004 0]	0.001 0*** [0.000 2]
TUR × REN		-0.002 4*** [0.000 6]	-0.003 6** [0.001 4]	-0.004 1** [0.001 6]	-0.000 2** [0.000 1]
SIZE			0.006 3*** [0.002 2]	0.006 2*** [0.002 2]	0.000 3*** [0.000 1]
AGE			-0.003 8 [0.005 0]	-0.003 6 [0.004 8]	-0.000 2 [0.000 3]
SOE			-0.023 4* [0.012 1]	-0.023 3* [0.011 8]	-0.001 3* [0.000 7]
EXPER			0.000 4 [0.000 4]	0.000 7 [0.000 5]	0.000 0 [0.000 1]
CAPITAL			0.011 0* [0.006 6]	0.011 0* [0.006 2]	0.000 6* [0.000 3]
CREDIT			0.008 0** [0.003 8]	0.009 4** [0.004 7]	0.000 5* [0.000 3]
COMPUTER			0.022 6* [0.012 0]	0.020 2* [0.011 0]	0.001 1* [0.000 6]
DIVER			-0.006 4 [0.014 2]	-0.008 1 [0.013 6]	-0.000 5 [0.000 8]
EXPORT			0.023 6*** [0.007 4]	0.022 6*** [0.006 9]	0.001 3*** [0.000 4]
FEMALE			-0.012 1* [0.007 6]	-0.011 5* [0.006 3]	-0.000 6* [0.000 4]
CSIZE				0.018 9 [0.013 1]	0.001 1 [0.000 8]
BUSY				0.013 6* [0.007 8]	0.000 8* [0.000 4]
GDP				0.000 6** [0.000 3]	0.000 1* [0.000 0]
EDU				-0.006 4* [0.003 4]	-0.000 4* [0.000 2]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产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083 8*** [0.009 5]	-0.083 2*** [0.009 9]	-0.100 3*** [0.021 8]	-0.224 2*** [0.080 8]	—
F(p)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Log likelihood	-114.289 01	-114.047 2	-52.925 5	-49.107 8	
伪 R ²	0.336 2	0.337 6	0.662 3	0.686 6	
N	1 669	1 669	1 542	1 542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方括号内表示聚合在行业层面的稳健性标准差。

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的积极影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交互项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并未全面反映交互效应检验的全过程,而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是交互效应检验的一个重要补充,它有助于我们正确辨识调节效应的真实效力。为此,我们绘制了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如图2所示)。在图2中,横坐标X轴是官员更替,纵坐标Y轴是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结果显示,随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逐渐弱化^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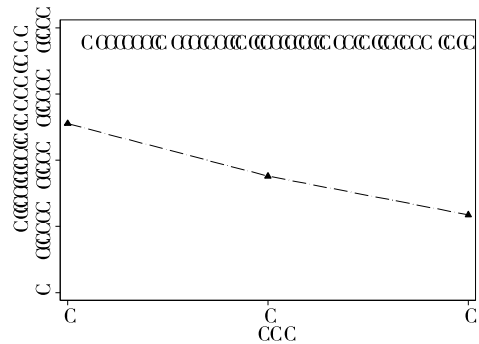


图2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联盟研发投入强度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内涵

中国经济正式步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为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构建一套规范、系统、有效的制度体系,已经成为政府相关部门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是中国谋求经济战略转型的关键任务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估了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显著弱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和强度,而寻租行为则强化了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与强度,进一步地,官员更替还弱化了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投入行为的积极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弱化,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强化。这一结论表明,受转轨时期改革方案的影响,司法质量对企业的保护作用虽有所体现,但并未充分地发挥出来,这使得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制于非正式制度,因此,司法质量与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具有互补的作用。通常地,随着司法质量的改善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影响会逐渐弱化,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联盟研发活动除了依赖司法机制外,还依赖寻租机制,由此说明,当前的制度改革还不能完整地保证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是当前政府各部门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增进了人们对地方官员治理如何通过寻租影响企业行为的理解。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内涵。

首先,在地方官员轮替交接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要严格执行任期制,避免官员成“临时工”。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由于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连续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动机,降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水平。地方官员的频繁更替会削弱辖区内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引发较高程度的政策执行波动,诱发地方官员执政行为的浮躁化、执政理念的短视化及执政政绩的泡沫化等系列问题,触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变得不明朗,从而妨碍了辖区内的企业联盟研发投入行为。为此,中央要避免领导干部职务频繁的轮替交流,确保领导干部职务更迭轮替的制度化、法治化和有序化。同时要始终贯彻人事行政的规律性,确保领导干部职务更迭轮替前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其次,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让法律成为企业联盟研发的坚强后盾。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良好的契约实施制度有助于弱化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消极影响,强化寻租行为对联盟研发活动的积极影响。基于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让法律成为保障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石。事实上,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负面影响可能源自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并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导致企业的投资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周期。因此,政府干预应该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领域中逐步退出。同时,政府还应该赋予市场经济运行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并要求这些法律体系具有公开、公正和平等的包容性,实

现市场主体的自由决策和分散决策; 保证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 实现公平竞争; 有效解决市场矛盾和纠纷, 维持市场秩序。此外, 还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有效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 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政府行为。

参考文献:

- [1] 刘华军 杨骞. 环境污染、时空依赖与经济增长[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1): 81-91.
- [2] SAKAKIBARA M. Formation of R&D consortia: industry and company effect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23(11): 1033-1050.
- [3] POWELL W, GRODAL S. Networks of innovators [M]// FAGERBERG J, MOWERY D, NELSON R. Handbook of Inno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6-85.
- [4] AHUJA G. The duality of collaboration: induceme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formation of inter-firm linkag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3): 317-343.
- [5] LUO Y.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managerial networking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case of China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24(13): 1315-1327.
- [6] LI H, ZHANG Y.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8): 791-804.
- [7] MUKHERJEE D, GAUR A S, GAUR S S, et al. External and internal influences on R&D alliance form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 SM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11): 2178-2185.
- [8] BEAMISH P W, KACHRA A. Number of partners and JV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4, 39(2): 107-120.
- [9] DUSSAUGE P, GARRETTE B, MITCHELL W. Learning from competing partners: outcomes and durations of scale and link alliances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sia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2): 99-126.
- [10] REUER J J, ARIÑO A, MELLEWIGT T. Entrepreneurial alliances as contractual form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6, 21(3): 306-325.
- [11] 何山 李后建. 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 R&D 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吗?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4(4): 30-40.
- [12]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M]. 上海: 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263-310.
- [13] LAWRENCE P R, LORSCH J W.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complex organization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67, 12(1): 1-47.
- [14] EISENHARDT T K M, SCHOONHOVEN C B. Resource-based view of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 strategic and social effects in entrepreneurial firms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6, 7(2): 136-150.
- [15] ARINO A M, RAGOZZINO R, REUER J J, et al. Alliance dynamics for entrepreneurial firm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45(1): 147-168.
- [16] LI D. Multilateral R&D alliances by new ventur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2): 241-260.
- [17] NARULA R, DUYSTERS G. Globalisation an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R&D allianc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4, 10(2): 199-218.
- [18] 宗庆庆 黄娅娜 钟鸿钧. 行业异质性、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研发投入[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2): 47-57.
- [19] KRISHNAN R, MARTIN X, NOORDERHAVEN N G. When does trust matter to alliance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5): 894-917.
- [20] KALE P, SINGH H. Managing strategic alliances: what do we know 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 Academy management patients, 2009, 23(3): 45-62.
- [21] 李后建 张剑. 腐败与企业创新: 润滑剂抑或绊脚石[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2): 24-58.
- [22] 申宇 傅立立 赵静梅. 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9): 37-52.
- [23] 罗党论 余国满. 地方官员变更与地方债发行[J]. 经济研究, 2015(6): 131-146.
- [24] BERG S V, JIANG L, LIN C. Regulation and corporate corruption: new evidence from the telecom sector [J]. Journal of

-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2 ,40(1) : 22-43.
- [25]DIABY A ,SYLWESTER K. Corrup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66(2) : 487-499.
- [26]BLOOM N ,BOND S ,VAN REENEN J.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 74(2) : 391-415.
- [27]CHEN Y F ,FUNKE M. Option valu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ecision [Z]. Hamburg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2003.
- [28]BERNANKE B S. Irreversibility , uncertainty , and cyclical investmen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 97(1) : 85-106.
- [29]李后建 张宗益. 地方官员任期、腐败与企业研发投入[J]. 科学学研究 ,2014(5) : 744-757.
- [30]黄玖立 李坤望. 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 经济研究 ,2013(6) : 71-84.

注释:

- ①在构建交叉项的过程中 ,首先分别将 TUR 和 REN 进行中心化 ,然后将中心化后的 TUR 和 REN 相乘构成 TUR 和 REN 的交叉项 $TUR \times REN$ 。
- ②限于篇幅 ,未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
- ③限于篇幅 ,本文没有列示稳健性回归结果 ,其中包括纳入的重要遗漏变量: 制度衡量; 剔除带有政治色彩的直辖市样本; 将寻租行为的指标替换为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的时间比例。

(责任编辑: 木 子)

Officials' Turnover , Rent-Seeking Behavior and Firm R&D Alliance

LI Houji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Chengdu 611130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ways in which officials' turnover and rent-seeking behaviors affect firm R&D alliance , using survey data of World Bank about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 op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 officials' turnover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nput tendency and intensity of R&D alliance investment , while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it. With the degree increase of the officials' turnover , the positive impact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on firm R&D alliance will be weakened , and this result is rather robust. Additionally , we show that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a way to weakening negative effects of officials' turnover on firm R&D alliance , but it strengthens positive effects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on firm R&D alliance. The research provides micro-empirical evidence to deeply understand firm R&D alliance behaviors.

Key words: officials' turnover; rent-seeking behavior; firm R&D alliance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teraction effect